

经济经营风险的 中日比较

马国强 主编

経済経営リスクの中日比較

Comparison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isk between
China & Japan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经济经营风险的 中日比较

马国强 主编

経済経営リスクの中日比較

Comparison of E
and Management
China & Japan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前 言

有人说 20 世纪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加希望 20 世纪后半期能够实现一个安定的世界格局。很多国家都在为实现由冷战、地域纷争的局面向社会经济安定发展的局面转变而努力。努力的结果令人欣慰，很多国家的经济实现了稳定、顺利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通信、交通、贸易和金融。也正是由于这些领域的发展，让人们感觉到世界在缩小，周游世界各地、举办各种活动都变成可能。可以说，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向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渗透，迅速导致了风险的凸现，风险波及速度之快让人惊心。因而，21 世纪成为一个需要重视风险的时代。

回顾 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们清楚记得危机产生时极大震动世界金融市场的情景。然而，2007 年发生的次贷危机，其规模和特征都与以往不同。次贷危机的直接表象是美国的住宅问题，但不能把它矮小化为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一点各国已经达成共识。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全球金融市场都已被网络联在了一起，所以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之后，迅速席卷了其他国家而成为金融海啸。这次危机的实质是世界金融体系问题。这次危机给各国造成的危害比以前任何一场危机都大，即使是先进工业国家，完全恢复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费用。综观这些危机，我们隐约感觉到 21 世纪也将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金融风险，其他领域也有风险存在，比如禽流感等传染疾病流行之快、规模之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东北财经大学和日本滋贺大学在 2003 年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友好交流与合作。2004 年，两校开始进行共同的学术研究。因为大连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对于研究东北三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在讨论东北三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时候，就必须考虑经济变动风险、货币变动风险、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等。两校共同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日本所经历的对环境问题、养老金和福利问题、对好的经营管理方法的摸索、技术转移及开发、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强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对发展中国家都很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学者通过共同研究，也可以了解变化中的中国的真实状况，并利用他们积累起来的

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来检验中国的实际情况。双方在共同研究中取长补短。

2008年，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两所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聚集在日本滋贺大学，发表共同研究成果，并在滋贺大学的努力下，其研究成果在日本正式出版。2009年，作为共同研究的第二阶段，在中国东北财经大学也举办了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会，报告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研究结果丰硕厚重。为了让更多学者和相关人士能共享研究成果，我们有责任把研究成果汇编出版。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中日经济所面临的国际风险相关联的题目；第二部分是与社会经济问题相关的中国和日本的危险问题；第三部分是研究关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其他领域的风险。

本书作者由东北财经大学和日本滋贺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第1章由东北财经大学金凤德撰写，第2章由滋贺大学小田野纯丸撰写，第3章由东北财经大学苏杭撰写，第4章由滋贺大学金秉基撰写，第5章由东北财经大学马国强、张海星撰写，第6章由滋贺大学北村裕明撰写，第7章由东北财经大学刘晓梅、廖藏宜撰写，第8章由滋贺大学邵文娟、东北财经大学刘晓梅撰写，第9章由东北财经大学史永东、武军伟撰写，第10章由滋贺大学二上季代司撰写，第11章由滋贺大学久保英也撰写，第12章由滋贺大学大川良文撰写，第13章由滋贺大学弘中史子撰写，第14章由东北财经大学李浩撰写。

编 者

2010年11月

目 录

第 1 部分 中日经济面临的国际风险

第 1 章 关于中国经济风险研究的框架	金凤德	(3)
1.1 风险的定义、类型及属性		(3)
1.2 风险研究的主题：目标、实现目标的主体和条件		(4)
1.3 中国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条件		(5)
1.4 中国经济风险框架		(5)
1.5 中国经济风险研究框架的解释及细化		(5)
第 2 章 国际经济风险要素和对外收支平衡的动向		
——中日美的比较研究	[日] 小田野纯九	(11)
2.1 绪论		(11)
2.2 美国风险的开始——“双赤字”		(13)
2.3 日美的对立与协调		(18)
2.4 繁荣的美国重新夺回世界经济主导权：国际风险的温床？		(19)
2.5 金融危机的时代与中国的崛起		(23)
2.6 总结：美日中三国的新动向与协调道路的摸索		(29)
参考文献		(30)
第 3 章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遇与挑战	苏 杭	(32)
3.1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		(32)
3.2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		(35)
3.3 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机遇		(37)
3.4 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39)
3.5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		(41)
第 4 章 金融危机与企业的结构调整		
——韩国的结构调整成果以及方向性	[韩] 金秉基	(45)
4.1 序		(45)

4.2 韩国型经济体系	(46)
4.3 1997 年金融危机和结构调整	(48)
4.4 全球金融危机和结构调整	(57)
4.5 总结	(61)
参考文献	(61)

第 2 部分 与社会经济问题相关的中国和日本的 risk 问题

第 5 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risk 问题研究	马国强 张海星 (67)
5.1 地方政府债务概述	(67)
5.2 地方政府债务 risk 的现实考察	(79)
5.3 国外地方政府债务 risk 管理的经验与借鉴	(88)
5.4 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risk 的策略与对策	(99)
参考文献	(119)
第 6 章 少子老龄社会的 risk 与财政体系	[日] 北村裕明 (121)
6.1 序言	(121)
6.2 少子老龄社会的 risk	(122)
6.3 养老保险制度与财政	(126)
6.4 医疗保险制度与财政	(135)
6.5 护理保险制度与财政	(139)
6.6 养老、医疗、护理制度改革与财政体系	(141)
参考文献	(143)
第 7 章 农民老后保障 risk 研究	刘晓梅 廖藏宜 (145)
7.1 问题提出	(145)
7.2 农村老年农民的保障现状	(151)
7.3 农民老后危机的防范	(156)
参考文献	(157)
第 8 章 大连市社区养老的现状和问题	
——以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为例	邵文娟 刘晓梅 (159)
8.1 大连市社区养老服务开展的背景	(160)
8.2 大连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	(163)
8.3 对大连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评价	(171)
8.4 大连社区养老存在的问题	(174)

8.5 小结	(175)
参考文献	(175)

第3部分 关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其他领域的风险

第9章 违约集聚与组合信用衍生品

——基于 Levy 过程的动态模型	史永东 武军伟 (179)
-------------------------	---------------

9.1 引言	(179)
9.2 文献综述	(181)
9.3 一般模型	(184)
9.4 基本模型在组合信用衍生品定价中的应用	(185)
9.5 结论与启示	(192)
参考文献	(194)

第10章 金融业务的变质及风险管理 [日] 二上季代司 (197)

10.1 前言	(197)
10.2 因金融危机而表面化的金融机构变质	(197)
10.3 金融监管上的问题点	(206)
10.4 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方案	(211)
10.5 结尾	(216)

第11章 促进人寿保险流动化的公允价格的计算

——通过人寿保险购入市场来看保险及资本市场的融合

..... [日] 久保英也	(219)
----------------	-------

11.1 与资本市场的融合——CAT 债券市场的现状	(219)
11.2 人寿保险及资本市场的融合——人寿保险购入市场的现状	(223)
11.3 围绕人寿保险购入制度的课题及规定	(225)
11.4 购入契约的收益率构造	(227)
11.5 与人寿保险购入相伴的风险评价	(229)
11.6 购买契约的价格构造及合理的价格	(233)
11.7 结语	(237)
参考文献	(238)

第12章 企业间劳动转移伴随的技术流出的风险和跨国公司

分公司的 R&D 投资	[日] 大川良文 (240)
-------------------	----------------

12.1 前言	(240)
---------------	-------

12.2	3 阶段的博弈模型	(242)
12.3	子博弈论完全纳什均衡的导出	(243)
12.4	比较在复数均衡的经济福利	(249)
12.5	结论	(251)
	参考文献	(252)
第 13 章	试论中小企业今后产品制造的状态 [日] 弘中史子	(254)
13.1	引言	(254)
13.2	关于产品的竞争力	(256)
13.3	和服务融合给企业带来变化——结论	(262)
	参考文献	(264)
第 14 章	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知识运用研究 李 浩	(266)
14.1	引言	(266)
14.2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266)
14.3	研究方法	(271)
14.4	数据分析	(271)
14.5	讨论	(273)
14.6	结论与局限	(274)
	参考文献	(275)

第 1 部分

中日经济面临的国际风险

- 第 1 章 关于中国经济风险研究的框架
- 第 2 章 国际经济风险要素和对外收支平衡的动向——中日美的比较研究
- 第 3 章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遇与挑战
- 第 4 章 金融危机与企业的结构调整——韩国的结构调整成果以及方向性

第1章 关于中国经济风险研究的框架^①

金凤德

风险研究应该成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没有笔直的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世界经济中的两大“样板”都闯下了空前规模的大祸——在宏观经济领域，美国经济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微观经济领域，丰田公司发生了空前的“召回”事件。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可见，对于未来，必须持两点论：只看、只讲光明的、有利的一面，而不去看、不去讲困难的、阴暗的一面，是不符合事物发展法则的，是非科学的，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被动。承认中国风险存在的客观性，主动地去发现和研究中国的风险，尽可能地做到“未雨绸缪”，把风险的破坏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应该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反对把“中国风险研究”政治化。

1.1 风险的定义、类型及属性^②

何谓风险？我们把“风险”定义为与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相悖的、对实现预期的目标不利的事物，以及实现目标的不确定性。

风险按照两两相对的类型可划分为两组：一组是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如地震、水灾、火灾、海啸、传染病等。社会风险，如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军事风险。当然，社会风险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战争、恐怖事件、经济危机、失业、破产、通货膨胀等。另一组是全球性风险和局部性风险，无论是自然风险还是社会风险，都可能是局部性的或全球性的。

对于风险的属性，至少应指出以下几点：

(1) 风险在时间上的未来性。当我们讲“风险”的时候，都是针对未来的事情而言的，如果“风险”一旦变成了现实，那就不再称作风险了，而是具体的灾难、事故、不幸等等。不言而喻，消除风险的对策是预防，而对于风险的现实——“灾难”、“事故”、“不幸”的对策是挽救。

^① 本文是在2009年9月由日本滋贺大学和中国东北财经大学联合举行的学术会议上所作的主旨报告，2010年4月作了修改；本文同时也是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东北亚FTA的轴辐结构与多边经济合作”的阶段性成果，该课题主持人来自“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经济全球化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

^② 这里主要参考并引用了日本滋贺大学酒井泰弘教授的关于风险经济学的理论，其代表作如《不確実性と情報の経済学》。感谢作者。当然，有不当之处，文责由本文作者自负。

(2) 风险之间的互动与转化。如上所述, 风险大致可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局部性风险和全球性风险。它们形成的条件、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造成危害的方式和途径各不相同, 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之间是互动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互相转化。

(3) 风险的两重性。这主要指的是风险的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 风险的可预防性和不可预防性; 风险的可化解性和化解风险的有限性; 风险的挑战性与化风险为可利用的机会性等等。

1.2 风险研究的主题: 目标、实现目标的主体和条件

根据我们为风险给出的定义——“风险, 是指与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相悖的、对实现预期的目标不利的事物, 以及实现目标的不确定性”, 可知目标是风险研究的前提, 而实现目标的条件和实现目标的主体则是风险研究的基本内容。

目标与条件是一对最基本的关系。实现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条件与目标形成因果关系。在预测学中经常运用的演绎逻辑是: 当满足 $\times \times$ 条件时, 就可以实现 $\times \times$ 目标。比如, 如果明年风调雨顺, 就可以实现获得丰收的目标。丰收是目标, 风调雨顺是条件。在对风险的研究当中, 我们把目标看成是既定的, 而把条件看成是可变的, 即改变原来设定的条件。在上述的例子中, 我们把条件“风调雨顺”假设为“洪灾”, 因而“丰收”的目标就成为了不确定的东西, 条件“洪灾”是“丰收”的风险。

目标又是具体“当事人”的目标, 也即实现目标的行为主体, 比如企业的目标或慈善机构的目标, 国家的或个人的目标, 中国的或美国的目标等等, 不同的主体自然会设定不同的目标。在同一目标下, 不同的主体具备或提出不同的条件, 对于风险的抗御能力和承受能力也是有差别的。在上述的例子中, 如果主体是中国, “洪灾”就是中国实现丰收目标的风险。

风险研究应该抓住三个环节: 主体、目标、条件。本文设定的三个环节具体是:

(1) 主体限定在国家层面。“国家”按照两两相对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大国和小国, 常态下发展的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的大国。

(2) 目标限定在经济目标。不同的国家自然会设定不同的目标, 目标尽管千差万别, 但是, 追求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则是共同的。

(3) 条件分为两部分: 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所谓一般条件, 是指经济学上讲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 所谓特殊条件, 是指特定国家实现其目标的特殊条件, 也可理解为“充分条件”。

总之, 本研究的主题是: 转型中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经济风险研究的框架。

1.3 中国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条件

1) 目标

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到 205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实现目标的一般条件

(1) 生存条件：环境

A. 社会环境：和平与稳定

B. 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

(2) 发展条件：创新

A. 科技创新

B. 制度创新

3) 实现目标的特殊条件

行为主体——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崛起所处的环境——特殊的时代。

一个特殊的国家，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要想求生存、谋发展，仅仅考虑一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仅仅考虑以往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一般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它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条件。

中国的国情特殊在哪里？归纳起来有三点：“发展中”、“转型”和“大国”。最本质的和比较陌生的特征是“大国”。中国是人口大国，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后发大国，如此大规模国家的崛起在世界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中国崛起所处的时代特殊在哪里？可概括为两点：全球化与大国崛起。如果说全球化进程早已开始了的话，那么，全球化与大国崛起相联系则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大国发展的特殊规律——发挥大国优势，实施大国战略，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而大国发展对国际社会的波及效应具有两重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做到——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和维持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要尽最大的努力减少负面效应，要自律，以避免带来世界经济的震荡，减少国际摩擦。简言之，大国战略必须兼顾两方面：一要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二要自律。所谓中国风险研究，说得具体一点、明确一点，就是中国在创立和坚持大国战略过程中的风险研究。

1.4 中国经济风险框架

中国经济风险框架的内容如图 1—1 所示。

1.5 中国经济风险研究框架的解释及细化

1) 划清界限：“中国 = 大国威胁论”与“中国 = 大国崛起”的负面波及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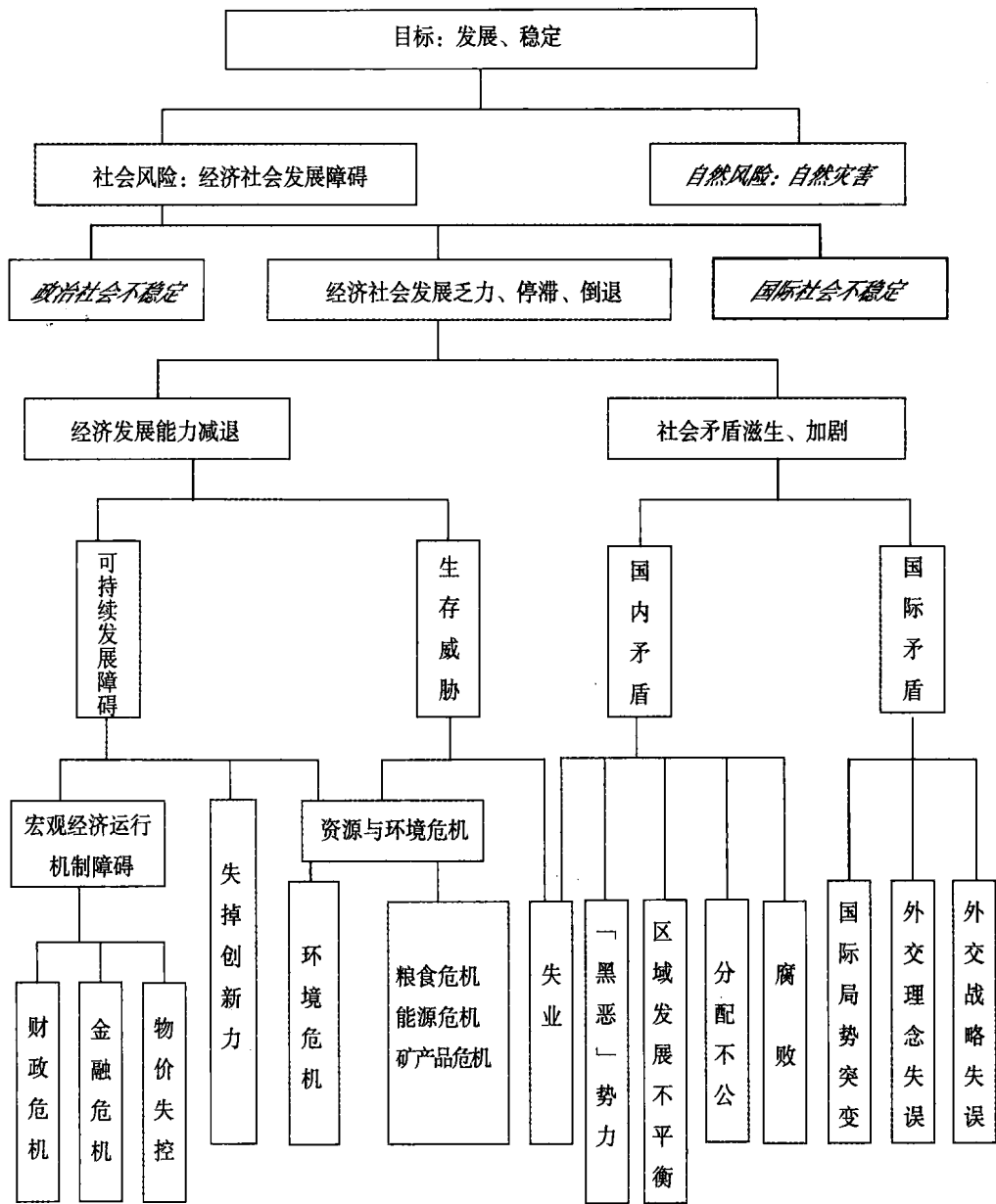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经济风险框架

注：斜体部分表示在本研究中暂时省略。设计本图时参考了〔韩〕이근·김병국：《2020 중국 리스크 ——중국경제 중장기예측과 리스크분석》第二章，2007，EAI。

国际社会确实存在“中国=大国威胁论”。我国国内也确有把大国崛起时可能出现的负面的国际波及效应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一概斥之为“中国威胁论”的情况。^①

对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大国对世界的影响比起小国来无疑是大的。影响,也就是波及效应,有些是正面的,如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表现,尤其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曾助推世界经济形成了长期的无通胀增长的局面;但也有负面影响,如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采购资源,加剧了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能不能像以往中小国家那样,只要有支付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无顾忌地采购?再比如,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的一大比较优势,中国是否可以无节制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促进出口?不能,也办不到。现在流行一句话: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落价;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40%,中印两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足以用世界的一“极”来形容。一只猫钻进瓷器店和一头牛闯进瓷器店的后果显然是不会一样的,因此,大国战略必须加一条:自律。自律是大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崛起时应有的品质、觉悟和胸怀,是“大国意识”的应有之义。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国际政治学概念,特指中国的发展必然挑战乃至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崛起的负面波及效果,是中国作为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世界产生的一种影响,是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互动性的表现之一(与此相对照,小国与全球的互动性比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是大国经济特殊规律使然,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不会、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以及怎么样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并反过来作用于中国自身。对“中国威胁论”,要警惕、批判;对“中国崛起的负面波及效果”的研究,要提倡、保护,因为这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划清这一界限,是研究中国风险问题的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

2) 度过“国际摩擦多发期”

从公元16世纪起,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苏联等国家先后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纵观它们的崛起史,似可认为,这其中除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崛起,都依靠着冲突乃至战争和掠夺,并把冲突、战争和掠夺作为崛起的必要条件。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直到英国的崛起,以及英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之后的世界若干后发国——法国、德国、

^① 比如,康晓光说: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康晓光:《2000—2050: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转引自天益网。

日本、俄罗斯的崛起，都可归类于冲突崛起。美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属于和平崛起^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德国的再崛起，也是和平崛起。

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是中国驶向目标彼岸唯一正确的道路。为坚持这一道路，中国必须努力争取顺利度过“国际摩擦多发期”。我赞成大国崛起时期国际摩擦发生几率的“倒U字形”的说法（如图1—2所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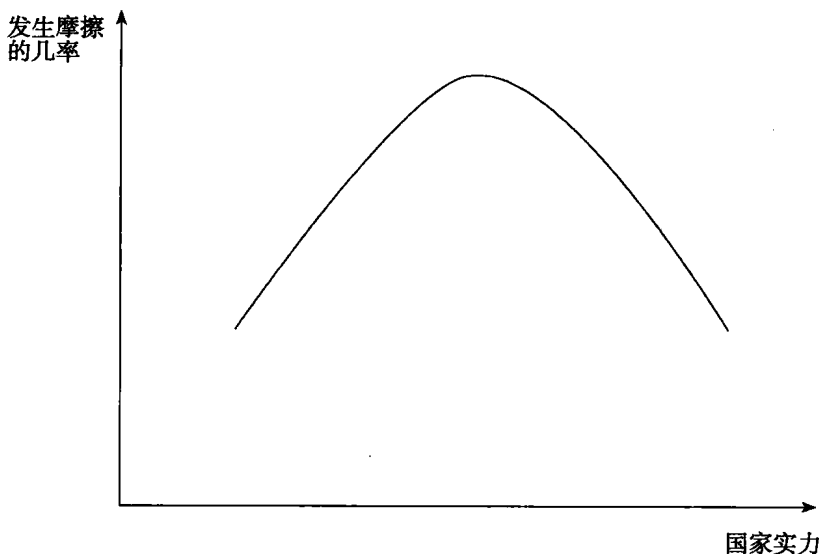


图1—2 大国崛起时期的“发生摩擦的几率—国家实力”关系图

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认识和态度，是国际关系观中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关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是否坚持和平崛起的根本标志。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谋求什么样的利益和什么样的地位，以及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加以实现，都将直接反映在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认识和态度上，每一个国家必须直面这样的选择——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反对，还是认可？是融入，还是挑战？是改进、完善，还是颠覆？另外，由于具体的国际秩序与当时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亦即霸权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对待国际秩序的问题往往与现存的霸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

① 参见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4）；孙学峰：《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对两种理论解释的质疑》，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5）；[韩] 정덕구：《대국중국의외대》，삼성경제연구소，2004년，P408。这里是作者与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的一段话——作者问：你怎样预测中美关系？是否认为中美冲突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叶回答说：……从历史经验看，那种认为崛起的新兴国家必然与既存的霸权国家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19世纪美国的崛起并未受到西欧的威胁。不错，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1812—1814年英美之间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是，这是性质不同的矛盾——不是新兴大国与既存霸权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众所周知，1860—1880年是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最关键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与其说美国受到了英国的威胁，还莫如说受到了英国的庇护更合适。

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黄仁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网，2004-10-21。

② 赵晓：《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6）。

义”(弗兰克·H. 西蒙兹和肯尼思·沃尔兹)。^①

3) 化解社会矛盾

稳定,不但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发展的目标。在战火隆隆、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富裕”还值得追求吗?在四处地震的环境下还能谋改革、谋发展吗?正确对待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间的关系,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一经验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也是“北京共识”的重要内涵。中国迎来了空前繁荣和平和的景象,从而充分证明,化解社会矛盾对于经济平稳高速发展的保障作用。然而,“稳定”不是铁打的,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指出,国内不稳定因素还在滋长,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有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迎刃而解,恰恰相反,过去的一些社会问题往往被经济问题所掩盖,一些原来并不突出、并不尖锐的矛盾可能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变得突出和尖锐,比如失业问题、收入分配和贫富差别问题、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民族问题、腐败问题、“黑恶”势力问题等等。不言而喻,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轻松,而任何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都有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

4) 摆脱资源约束

从经济学角度看,“资源约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经济学即资源配置学,就是讲怎样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方面去。如果资源不是稀缺的,无须接受任何约束,经济学这门科学就不会产生。那么,这里提出“资源约束”对中国有什么意义?第一,“地大物博”的中国已成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开始重新评价本国资源的丰裕度,这是中国人对本国国情的再认识,是中华民族从“地大物博”的幻觉中走出的伟大觉醒。第二,资源约束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由“流量约束”走向“存量约束”。^②第三,在“地大物博”的判断下、在资源的“流量约束”的环境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都需作相应的调整,这是包括改变消费价值取向在内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谛所在。

资源约束问题对中国如此严峻,还有历史的原因:一是中国正处在重化学工业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而这个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二是中国崛起“不逢时”。按照库兹涅茨的世界经济史时期划分法,现代经济始于1750

^① 转引自谭再文:《大国作用的侵蚀——对国际关系中大国逻辑的一种思考》,载《国际观察》,2004(4)。

^② 宋旭光认为,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是以“流量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受到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资源向现实资源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的是资源获取的速度,而不是资源是否存在。然而,当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接近枯竭的时候,资源约束就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量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对于流量约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手段使约束逐渐弱化,而当经济体面临存量约束时,经济发展通常要受到比较大的阻滞。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其资源流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我国15种关键资源的流量与存量信息分析发现,我国的资源约束问题既有流量约束,也有存量约束,但总体说来,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存量约束将成为问题的主要方面,这是对中国现阶段资源约束问题的基本判断。参见宋旭光:《资源的存量约束阻滞经济发展》,载《财经问题研究》,2004(11)。笔者赞成这个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想进一步指出,资源的“流量约束”和“存量约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约束。前者是一种有弹性的约束,价格机制起作用;后者缺少弹性,价格机制趋向失灵。